

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

金以林

内容提要 抗战爆发后,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大都被日军控制,香港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国际交通门户。为了充分发挥香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民党中央将原设在香港、澳门的基层组织“港澳直属支部”提升为“港澳总支部”,以期加强领导。但港澳总支部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陷入党内人事纠纷,并没有在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 国民党 党务 香港 朱家骅

有关抗战时期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状况,以往学界鲜有研究。^①笔者有幸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家骅档案”中查阅到“香港党务”档案一卷,该卷档案相对集中呈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发展状况。本文即以该卷档案为核心,并参考国民党其他党务史料,对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党务问题予以疏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 港澳总支部的建立

孙中山在领导革命之初,即同海外华侨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并

^① 有关战时香港国民党党务研究方面的论文笔者仅见刘维开著:《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港九地区的活动》及李盈慧著:《沦陷前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动》,见《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编印,第441-499页。

在革命党内设有海外党部。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海外部一度由中共党员彭泽民负责。国共分裂后,1928年4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海外党员总清查登记办法,派员分赴海外从事宣慰及指导党务,其组织形态仍依照同盟会时代之成规,分为总支部、支部及分部三级。但在港澳因受殖民当局的限制,国民党自改组后始终无法公开活动,港澳党务活动只能隶属于广东省党部。据1931年11月统计,海外总支部及直属支部共40个,均无港澳支部。^①直到1934年国民党才在港澳正式设立直属支部。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负责港澳事务的机构较杂,既有外交部驻外领事机构,又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教育部、国民党组织部、宣传部和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等众多部门,设有专职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港澳事务。此外,国民政府兵工署、航空委员会、中央信托局等也设有驻港机构,负责军用物资的采购。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我国东南沿海港口几乎都被日本侵略者控制。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交通门户,无论是海外军火物资的输入,还是内地农矿产品的输出都要经过香港转运。因而,香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据亲赴港澳视查党务的罗翼群、区芳蒲^②报告:

①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工作报告书》(1931年11月),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8年编印,第204页。

② 罗翼群(1889-1967),广东兴宁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护法战争。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出任广州大本营军法处长、兵站总监、军需总局局长。后赴日本。1931年回国,先后担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区芳蒲(1891-1951),广东南海人,早年投奔陈济棠,曾任八路军军政训部主任、广州市长、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

抗战以来,香港地位日形重要。侨港同胞数逾百万。雄于资者富商巨贾、饶于力者技术专才、社会中坚、国中耆硕荟萃于此,盛极一时,潜蓄力量至为丰厚。惟是分子复杂,意向纷歧,各自为营,漫无中轴。依违之间,端视吸引有如素丝随熏成染。苟能及早运用党国力量,收而纳之于抗战建国之一途,无形之中蔚成党力,效果所至,未可限量。敌方近亦有见及此,正积极运用其怀柔政策,妄冀与我争取民众,广布谍网,肆意活动。意志薄弱者流,最易堕其壳中,殊属可虑。夫城可弃、土可焦,民众万不可失。此诚千钧一发之时也。故香港一隅之在今日,就资源、力源之接济,俨成重要之后方,而就政治上我敌间之尖锐暗斗,又隐同紧张之前线。故党力之及时运用于香港,在整个抗战方略中实占重要之成分。^①

正是鉴于香港在战时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即着手加强在香港的党务指导。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改进党务及调整党政关系案”,首先对国民党中央指导海外党务工作的组织机构作了较大调整,取消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改设海外部,负责海外党务及宣传事宜。^②海外部成立后,立即开始加强驻港澳机构的设置,以期最大限度地调动香港的人力、物力,并利用香港在战时的特殊地位,为抗战建国服务。

此时,国民党在香港、澳门设立的直属支部状况简直是形同虚设。以香港支部为例,“经费原额每月国币七百元。嗣迭奉令节减

① 罗翼群、区芳蒲:《港澳党务视察报告》(1939年3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之“香港党务”,毛笔原件。以下均简称“朱家骅档案”,档案号同为:30-3。

② 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115、126页。

七折,复九折发给。自去年(1938年)九月份起,每月仅得国币四百五十元,折合港洋仅二百余元。以之支付租项、邮电等费尚虞不足,遑论其他。是以该支部虽有良好计划,亦无从按步推进,形同搁浅”。^①而澳门支部经费仅为180元。^②

为整顿港澳地区党务工作,1939年3月,国民党海外部向中常会提出《改进香港党务纲要》,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充实组织机构,“将原香港、澳门两直属支部合并组织港澳总支部,并参照省市现行制度,由中央特派大员一人为主任委员”;二、增拨经费。因港澳地区“党员自己养党目前确未易做到”,故“拟请中央按员拨给国币壹万元”,并规定“职员薪给及办公费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事业活动费不得少于百分之六十”。^③《纲要》经国民党中常会审议通过,唯一修改的是将经费减少为每月五千元。^④

1939年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20次会议通过《驻港澳总支部组织条例》;18日,中常会第121次会议通过吴铁城为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高廷梓为书记长;6月15日,中常会123次会议决议派陈策、区芳浦、俞鸿钧、欧阳驹、简又文、陈剑如、陈素、高廷梓为执行委员,下辖香港、九龙、澳门三个支部。同年底,因广东沿海地区大都沦陷,又将原广东省党部下辖的广州湾区党部划归

① 罗翼群、区芳浦:《港澳党务视察报告》(1939年3月25日),“朱家骅档案”。

② 《二十八年度中央经费每月支出(各级党部经费)预算表》,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③ 《改进香港党务纲要》(1939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55-58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7次会议纪录》(1939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77页。

港澳总支部指导。^①

二 港澳党务的人事纠纷

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国民党在香港的党务工作即陷于各种人事纠纷之中。有研究指出:

战时国民党为谋对抗共产党与日伪组织在香港的活动……建议以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取代侨委会及教育部的工作,形成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当时侨委会委员长与海外部长同是陈树人,他在党部与行政部门工作重叠时,只能设法划分职权,以免互相冲突。经此纷争,陈树人的海外部长职务被处事积极的吴铁城所取代,益加凸现陈树人与世无争的风格,同时也强化国民党在港澳的动员力量。^②

以上论述实是暗示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吴铁城与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形成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现象。但据笔者的考证,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陈树人的风格固然“与世无争”,由于他一人身兼党政两职,均为港澳工作的直接上级主管,本不易引起党政冲突。笔者认为其真实原因,主要是来自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吴铁城与时任中央秘书长朱家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吴铁城不甘屈就总支部主委一职;另一方面,朱家骅又极力想

① 《五届六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39年1月-11月),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8年编印,第143页。

② 李盈慧前揭文,《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60页。

加强对总支部控制,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之间的矛盾从当时国民党在香港设置的秘密机构或许可以看出些端倪。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国民党不能在香港公开党务活动,因此设有多处秘密机构,其中“荣记行”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当为其重要据点。在笔者查阅到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两处机构多有所误解。有论者谓:“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香港办事处应当就是荣记行。”其主要依据是日本特务机构对国民党驻港机构所作的调查:“荣记是以商业公司的组织作为伪装,从事情报搜集、对华侨的抗日宣传等工作”,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是国民政府的宣传书刊之印刷所,受荣记之监督审查”。因此,该论者以此判断国民党在香港的“印刷所想必是西南图书印刷公司”。^①

不过据陈立夫回忆:“吴铁城担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时,也兼指导闽、粤两省宣传工作的责任,他以香港荣记行作为活动地点。”“荣记行内设‘编译室’利用津贴款项,招揽滞留香港的文化人,派他们任委员,写些海外社论,又出版一些定期刊物,每人薪水100元。”^②从以上回忆分析,“荣记行”的工作内容更似“驻港宣传专员办事处”,这与吴铁城初到香港时的身份是相符的。因而“荣记行”并非“港澳总支部”所在地。

1939年5月4日,吴铁城到香港后曾致电时任中央秘书长的朱家骅表示:

弟奉总裁密命来港主持党务,指导一切,另由中央常会第

① 姬田光义解说:《重庆中国国民党在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转引自李盈慧前揭文,《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0、451、466页。

② 陈立夫:《气度恢宏的吴铁老》、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转引自李盈慧前揭文,《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64-465页。

一一九次会议议决推派弟任驻港宣传专员,办理关于闽、粤两省战区宣传事宜。此间办事处已于东日成立,开始工作。印刷公司及报纸亦正在积极筹备,至迟月杪必可出版。港方党务未能公开活动情形,兄所深知。在此情况之下,对内推动并无问题,而对外名义须预为假定,以求适应环境,庶可推行尽利。此后对外如有必要时,拟宣称中央政府及委员长驻港代表,且以此间交通便利于接洽一切为词,使港当局明了弟之任务不专在香港一隅耳。^①

此电可以清楚地看出吴铁城并不满足于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一职,他到港后首先成立的不是“港澳总支部”,而是“驻港宣传专员办事处”,其最终目的是想做“中央政府及委员长驻港代表”。而此时朱家骅还是希望借助吴铁城的力量,支持自己的亲信、新任港澳总支部书记高廷梓。为了扶植高廷梓,朱家骅特意致电吴铁城表示:“承示一节,当即转陈。廷梓兄今日飞港襄助,渠于新闻事业尚有经验,对新办报纸当可有所效力也。”^②

高廷梓(1895-1984),广东新会人,192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先后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教授、教育部简任秘书兼社会教育司司长。1938年任中央党部党务委员会秘书暨教育委员会专门委员,多次在朱家骅领导下工作,为朱氏亲信。

5月8日,高廷梓到港协助吴铁城工作。但他并没有获得吴铁城授命创办国民党在香港机关报《国民日报》的筹备工作。吴将此工作交由陶百川负责,由陶出任香港《国民日报》社长,两个月

① 《吴铁城致朱家骅快邮代电》(1939年5月4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朱家骅复吴铁城电》(1939年5月8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后,该报在香港创刊。

据高廷梓到港后给朱家骅的报告称:“总支部对外名义决定为‘西南图书印刷有限公司董事会’。”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秘密据点为“西南图书印刷公司”,而非“荣记行”。具体负责总支部事务的高廷梓到港后,因其商租的办公处原租客尚未搬出,故“暂时仍借荣记为通讯及接洽处”。^①高廷梓的电报从逻辑上清楚地解释出“荣记行”和“西南图书印刷公司”的关系。而吴铁城之所以看中“荣记行”,而非“西南图书印刷公司”,主要因素是前者为中宣部“驻港宣传专员办事处”,后者则是海外部下辖的香港总支部。

吴铁城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理由是,战前海外党务工作原由中央海外部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负责。抗战开始后,海外部和侨委会对海外党务、文宣工作只予以原则性的指导,实际决策权则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尽管战时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的是隶属于中宣部的国际宣传处,但中宣部却无权干涉其活动,实际事务均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其人事、经费均从军费项下开支。^②这也正是吴铁城选择“荣记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再从国民党中常会批准的港澳总支部的经费来看,当高廷梓向吴铁城报告经费不足时,“铁城先生以为原定经费国币五千元,合港币二千七百元,只可作为总支部及三个支部之行政经费,至事业费应另行请款。事实上如照原来经费进行,确是困难。以本港情形之复杂,敌伪汉奸与异党活动之猖獗,二千七百元亦仅足以打消敌伪之收买报纸及报馆主笔而已”。^③为此,高廷梓重新拟定

① 《高廷梓致朱家骅函》(1939年5月22日),钢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李盈慧前揭文,见《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47页。

③ 《高廷梓致朱家骅函》(1939年5月22日),钢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总支部每月经费港币一万八千三百元”。但这在朱家骅看来，经费“似属太多，难获常会通过”，而予以否决。^①而吴铁城在筹款方面，另有渠道，他办《国民日报》可以从军事委员会申请经费，不仅中宣部无权干涉，也可不受中常会的约束。

在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吴铁城与朱家骅之间在用人方面的矛盾就已隐现出来。成立港澳总支部的动议，最早是由海外部在1939年3月呈国民党中央《改进香港党务纲要》中提出的，并立即得到朱家骅的支持。朱家骅通过自己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迅速审议通过，并报请国民党中央常会批准。^②

中央党务委员会，是在1938年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后成立的新机构，主要负责掌理党务审议设计及总裁蒋介石或中常会交办事宜，并联系各部处之工作。设主任委员，由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委员14至20人，由蒋介石提经常务委员会通过任命，并以各部部长为当然委员。^③

对于成立港澳总支部一事，吴铁城并没有异意，只是对总支部人选问题有自己的主张。为此，他在赴港前亲笔致函朱家骅表示：“香港总支部组织及人选问题，弟意俟到港后详查各方情况如何，相宜再行电商。……总支部主任委员亦请暂缓提会，候弟到达再电告办理。”^④吴铁城的目的是想等自己到香港了解情况后，再行组织班子，他并不以总支部主委一职为满足。但朱家骅对此不以为然，另有自己的想法和设计。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朱家骅

①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39年6月1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17次会议纪录》(1939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6-7页。

③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3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437页。

④ 《吴铁城致朱家骅函》(1939年4月1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不仅迅速成立了港澳总支部，配备了全部执行委员，并复函吴铁城解释道：“关于香港总支部组织已由海外部提出，经党务委员会通过。将来倘有高见，当照提修正，并当商请树人先生照办。惟主任委员一席，仍请屈就，以利工作。”^①

朱家骅在促成港澳总支部成立之初，以“防止汉奸敌探活动”为由^②，还在总支部下特设调查统计室，由陈积中负责。调查统计室既是港澳总支部的下辖机构，又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局），局长由朱家骅兼任。如此一来，陈积中可跨过总支部和吴铁城直接向朱家骅汇报。而查中常会通过的《驻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规定，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由7—9人组成，由主任委员主持会务；执行委员会设书记长一人，承主任委员之命，处理日常事务；总支部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科和侨民指导委员会。^③该条例并无调查统计室这一机构设置。国民党在海外直属支部广泛设立调统室，是在1940年五届七中全会以后，由中央海外部统一部署，办理一切调查情报统计事宜。^④

由于朱家骅和吴铁城两人对港澳总支部的不同态度，很快引起内部矛盾，形成两派对立。一派是原港澳支部的老人，以陈素、周雍能为首，唯吴铁城马首是瞻。吴铁城在战前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而香港、澳门支部最初是隶属于广东省党部的。周雍能、陈

① 《朱家骅复吴铁城函》（1939年4月19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改进香港党务纲要》（1939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55—58页。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0次会议议事日程》（1939年5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342—343页。

④ 《五届七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254页。

素两人同庚(1893年生),与吴铁城同为广东人。他们早年跟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北伐时,周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科长,陈任总政治部社会科长。抗战爆发时,两人分别在香港、澳门直属支部服务。陈还是新成立的港澳总支部首届执行委员,同吴铁城的历史渊源更深。另一派以高廷梓、陈积中为首。他们时常跨过主任委员吴铁城,直接向中央秘书长朱家骅报告或负责。这自然引起吴铁城的不满。由此可见,将此后的港澳党务纠纷视为吴铁城与陈树人之间、意或“党部与行政部门的争权”,似有不妥。另一个例子是,深得吴铁城信任的周雍能虽没有被朱家骅委以港澳总支部执委,但仍被吴铁城委以总支部下辖的澳门支部书记,同时兼任广东省侨务处长,一人身兼党政双职。^①

从总支部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年多来内部纠纷不断,甚至有人将“全体同志划分为新旧两派。前者以陈积中同志为首,新调港同志附之;后者以陈素先生为首,原有在港澳同志附之,以为分划挑拨口实。基此新旧之中,不免时生猜忌”。^②“新派”的陈积中7月15日抵港,短短数日即以中统局雷厉风行的作风在总支部内成立调统室,他21日函告朱家骅:“职室现已成立,一切当秉钧座意旨,努力做去。”他还对尚在改组中的港澳总支部组织人事,提出自己的意见:“职意党务工作应从健全本身机构着手,俟基础

① 周雍能:《三十五年来我与铁老》,《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93年3版,第235页;另见沈云龙访问、陈三井、陈存恭记录:《周雍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4编印,第150页。据周回忆:“廿八年英国对德作战,国际情势紧张,中央以香港地当要冲,派铁老驻港组织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联合港澳同胞,并策动南洋华侨共救国难。”事实是港澳总支部成立于1939年5月,而英法对德宣战则迟至当年9月。

②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1941年8月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巩固后,始能谈到推进工作。故一面须从速改组支分部,加强组织与领导,一面须视人力、物力之配备,及斟酌当地情形,定计划,切实可行,庶无头重脚轻、大而无当之讥。”^①“头重脚轻”、“大而无当”是否针对吴铁城兼任总支部主委一事,不得而知。但对陈积中的表现,朱家骅深以为然,复函称赞到:“港室成立、积极工作各节,至用嘉慰。党国艰危,惟希益矢奋勉为要。”^②

由于有朱家骅的支持,故“新者以历史较短且寄重一方居于领导地位”。^③吴铁城担任港澳总支部主委不满半年,于同年11月升任中央海外部长,仍兼总支部主委,成为港澳总支部从中央到地方的实际负责人。与此同时,朱家骅则调任中组部部长。^④但此后“新派”高廷梓等人仍时时、事事向中组部长朱家骅请示。1940年2月,高廷梓还致函朱表示:“此间工作每月均有报告,每周亦有会议录呈报。”^⑤这自然引起“老派”陈素等人的不满,他们对“书记长高廷梓先生多所攻讦,甚或取对立状态,致动轧掣肘,力量分散,影响工作至钜”。此前,陈积中因有朱家骅的支持,当调统室经费不足,总支部又无力支付时,常常得到中统局的额外补助。此后,调统室向总支部申请正常经费时,老派即以“本室经费有局补助为词遭否决”。^⑥此时,朱家骅不好再过分插手海外部事务,只好复电安慰牢骚满腹的高廷梓道:“委员制大都如此”,“港地一切工作

① 《陈积中呈朱家骅函》(1939年7月21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朱家骅复陈积中函》(1939年8月29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1941年8月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④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149-150、138页

⑤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40年2月23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⑥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1941年8月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均属重要,思想尤须注意。书记长有明定之职权,宜以至公无私之精神负责做去,精诚团结,化除一切成见。不求事事成于我,只求于党国有益,事事都可容忍,劳怨在所不计。”^①并告诫高:“书记长秉承主委襄助会务,不可只注重一部分工作;铁城先生当无此种成见,恐有人中伤,万不可置信。”^②

1941年4月2日,吴铁城接任中央秘书长,不再兼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总支部面临改组,内哄更加激烈。任职调统室的朱学贤曾将内部纠纷情形呈报吴铁城,希望吴能藉总支部改组之时予以“相机调整,使海外党务能在实干中建立深厚基础”。但未能得到吴的支持。^③而朱家骅因职务转移,更是无能为力。在原有港澳总支部执行委员中,掌握实权的是书记长高廷梓。但吴铁城并没有选择高,而是推荐总支部执行委员资历最老的陈策代理,并报经蒋介石同意,再告之中组部长朱家骅。^④

与此同时,老派人物乘高廷梓离港赴渝述职之机,向他的书记长职位发起挑战。高廷梓面对现实,只好请求辞去书记长一职,并向朱家骅诉苦道:“别后归来,惟有缄默,谨候中央意旨。此间人事,似不免全部改组,缘陈素勾结澳门支部常务委员周雍能等乘弟离港,彼等即指使不肖份子破坏党员征求,以图鼓动风潮,而谋打击。幸各同志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彼等乃告失败。关于书记长一职,拟请就卢逮曾、林式增、王懋勤、陈剑如、李朴生、司徒优六同志择一荐充。”^⑤

①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40年3月15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40年3月19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1941年8月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④ 《吴铁城致朱家骅函》(1941年4月19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⑤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41年4月13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此时,朱家骅对港澳总支部的人事安排已无权干涉,他复函高致歉道:“弟曾向各方设法”,但“事与愿违,深为歉意。”“务希吾兄体会时艰,毋再请辞。因兄一离开,则今后港澳党务无从再言发展,即兄两年来努力造成之基础,亦必不能保持也。”^①

但港澳总支部内部的派系纠纷则愈演愈烈,反对高廷梓的老派人物不断“鼓动风潮”,甚至“收买工棍作声援,喊出肃清中大少壮派口号”。此口号实是直指高廷梓的背后靠山朱家骅,因朱家骅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高廷梓曾在该校任教。为此,高廷梓再次致函朱家骅请求支援:“如果对人事无全权重新调整,处此非常时期,实不能一刻继续负责也。”^②但朱也仅能复函表示:“环境复杂,肆应良苦,仍希一秉至公放手做去。”^③

“新”、“老”两派的内斗,最终以“新”派失败告终。高廷梓此后仅坚持不到半年,即于1941年11月辞职返回重庆。^④书记长一职最终由陈素接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主委陈策脱险赴重庆,陈素又当选为总支部主委。但此后的总支部已无法在港澳立足,被迫迁至广东沿海港澳边陲一带活动。^⑤

三 港澳组织、宣传工作检讨

港澳总支部成立后,除内部纠纷不断外,针对港澳地区的组织、宣传工作亦有许多值得检讨之处。

①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41年4月25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41年5月4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41年5月23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④ 《高廷梓呈朱家骅电》(1941年11月13日),电报抄件,“朱家骅档案”。

⑤ 《战时历任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委员名单》,转引自李盈慧前揭文,《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73页。

按照海外部向中常会提出的《改进香港党务纲要》规定,港澳总支部成立后的工作要点共五项:“一、吸收优秀份子;二、沟通海外侨胞情谊;三、促进香港侨民文化;四、策动捐款献金等活动;五、防止汉奸敌探活动。”^①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发展党员,这是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主要工作;二是对外文宣、发动民众(即纲要中所涉及的第二、三、四项),三是“防止汉奸敌探活动”,主要由总支部下设的调查统计室负责。

朱家骅最初指示高廷梓的工作重心也是“征求党员”和“发动民众”。^②按高廷梓的设想,对于“征求新党员一节”,他“以为似须先行充实内部,整理阵容,方能进行”。“除依照通常办法进行外,俟第一期训练班结束后,策动中级干部作征求党员,总动员三个月后,必有相当收获”。至于“发动民众”,在他看来,“党部工作最好能兼办侨务,以侨民长官名义对外最为适宜。因侨务包括范围广大,各种事业似可借此推进。况名正言顺,事半功倍”。为此,他想借澳门支部周雍能兼广东省侨务处长的前例,向朱家骅建议在香港设侨务局,“如有困难,可否给予侨委会代表等名义,以便号召”。^③而朱家骅更看重发展党员数量,以此扩充实力,复函表示:“侨务委员会名义事,当与树人先生商之。至征求党员一切,在训练班开办以前应即先行进行。”^④

在港澳总支部成立前,因原有组织“忽略自身任务,以致党务工作多半陷于停顿状态,不能与其他工作平均发展”。因此,中央海外部要求海外各级党部首先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报到,并限港澳

① 《改进香港党务纲要》(1939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5卷,第55-58页。

②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39年5月29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39年6月1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④ 《朱家骅复高廷梓函》(1939年6月15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支部于1939年5月办理完毕。此前香港、澳门两地计有党员人713人,到期完成报到登记者仅529人。而按海外部的要求,至1939年11月,半年内分配港澳总支部征求新党员的数量是1644人,实际只完成236人,仅占计划的14.3%。^①因此,发展新党员成为港澳总支部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完成上级的指示,高廷梓被迫放弃原有设想。此后港澳总支部发展党员人数突飞猛进,据统计1941年3月以前,港澳总支部发展新党员1517人,此后半年又发展了4930人,这一成绩令港澳总支部成为中央海外部所属的各级直属支部中的最佳单位。^②除港澳总支部外,当时在港澳地区活动的国民党基层组织还有中华海员党部。^③该党部的工作成绩更是惊人,仅1939年4-9月即发展党员4789人,平均每月发展党员近800人^④,而该党部每月经费才仅315元。^⑤

尽管国民党在港澳地区发展党员成绩斐然,但党员素质和应发挥的作用,实在有限。港澳总支部和海员党部同在香港,彼此间很少往来,甚至相互敌视。高廷梓上任不久就曾致函朱家骅表示:“海员党部方面截至现在为止,弟甚隔阂。平日与该部人员绝少往

① 《五届六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39年1-11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142、150-153页。

② 《五届八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41年3-12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286-287页。

③ 按国民党的组织架构,除按区域设立党部外,另设有军队、铁路和海员三个特别党部。

④ 《中央组织部六个月工作计划要目》(实施期间二十八年四月至九月),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3年编印,第326-327页。

⑤ 《二十八年度中央经费每月支出(各级党部经费)预算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24卷,第389页。

来。以目前职位而论，实无权过问该部事务。彼方不重视友谊关系，亦不足为怪也。”^① 海员党部的基层党员大多为广东人，而该部下设的组织、总务、宣传、训练四个科长，一人为江苏人，三人为安徽人，“对广东海员不无隔阂”。一次，海员党部书记长李遂先应高廷梓之约来访，“但仅仅数语即辞，意欲避免论及内部”。^② 据熟悉海员党部内情的谢太清报告称：“该部工作一向以纸上谈兵、欺上瞒下为能事。……最近上海区征求一千八百余名新党员，所列名册，其中有名无人者有之，重复入党者恐亦有之，因沦陷区入党可免相片，故有此弊。又香港区征求新党员五百余名，皆属失业工友，亦有此间游民。最近该区主持人陈林扬深知失业工友之弱点，佯称入党之后，党部即可拨款救济。不问质素如何，滥竽充数，份子复杂，贸然不知，只求数量增加，摄影费用亦由部内开支，在工友何乐而不从，如斯党员，恐亦无益于党。”^③

对于战时各级基层组织招收的新党员，吴铁城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报告时也不得不承认：新入党者“多半未经认真选择，严格审查，冗滥之弊，犹未能尽免。主管部虽有‘宁缺毋滥’的指示，然尚未能确实做到”。“尤其新入党者，未能完全编入区分部或小组，形成‘有党证就是党员’的现象”。^④

造成港澳地区党员素质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驻港澳地区各级国民党组织之间不能精诚团结外，国民党与三青团驻港澳机构也是貌合神离。尽管朱家骅一度在中央兼代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书记长之职，而在地方的高廷梓始终不愿同三青团香港支部合

①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39年7月8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41年6月13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谢太清：《海员党部内部弊端》（1941年7月26日），钢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④ 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0页。

作,他曾向朱明确表示:“青年团港支团事,弟决不参加。因与小孩子较长短甚无意义也。”^① 1940年6月,三青团成立驻港澳直属区团部筹备处,任命高廷梓兼任干事,高即以国民党港澳总支部公务繁忙为由请辞。康泽原本还想请朱家骅斡旋,朱为此特向康泽解释:高之辞职“当系实情,自以准其辞去为妥”。^②

此外,“海外各地党部与使馆,过去因历史关系不相联系,甚至对立,对于推进党务殊不便。海外部为矫正此弊,曾于二十八年(1939年)拟定‘海外党部使领馆联席会座谈会要旨’,通告每月举行一次”。^③ 香港因离祖国最近,交通便捷,由于种种原因留港的中央委员较多,“中央原定有每星期开谈话会一次”。但作为驻港大员、港澳总支部主委的吴铁城对此也不热心参与,“此间实情,会既不如期举行,谈话内容以及各人意见如何,中央亦无情报”。^④

国民党在港澳党务的组织工作中既存在如此多的弊端,其发动民众,对外宣传的功效更可想而知了。

战时国民党在港澳地区的宣传方针主要三点:一是沟通海外侨胞情谊,协助政府推进战时政令;二是对外争取友邦同情与援助;三是纠正纷歧错杂的言论思想为主旨。但由于国民党在港澳地区的组织政出多门,“横的部门与纵的系统多有脱节”,造成党报(香港《国民日报》)与“党部之宣传科无密切之联系”。^⑤ 此外,“亦因经费困难,同时下级党部又多不能积极运用社会的人力与财力,所以亦不能发挥很大的效果。特别是宣传技术的呆板低劣,有时

①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39年7月8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康泽朱家骅往来信函》(1940年10月6日、13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③ 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9页。

④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39年6月1日),钢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⑤ 《五届六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39年1-11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145页。

且不免弄得民众对于宣传人员,发生厌恶轻视的观念,致削弱了宣传的功效”。甚至引起“盟邦对我不免苛责”。^①

尽管国民党各级组织在总结港澳地区文宣工作时,都能罗列出一系列的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胜于自己。中央海外部的一份报告中有一段记录海外文宣工作的失误和总结,还算不失公允:

宣传工作:

一,一般的日报,比抗战前有质量之进步,因(1)国内沦陷区域,为报馆最发达之地,国内既停业,乃迁海外;(2)抗战发生,侨民阅报之需要大增;

二,知识分子到海外避难者甚多,学校亦有质量之进步;

三,共产党或左倾份子因生活较劣,须争社会地位,工作势力言论受其操纵;

四,本党机关报,则销路不见增加,反有支持不易之势,其原因:(1)工作人员恃有背景,毋须努力;(2)各派皆拥护中央,机关报拥护中央之特色与号召不引起注意;

五,本党定期刊物在重庆甚多,而在海外之发行不甚注意,远不如其他之流畅。国内共产党之刊物,亦多见于书摊。

……

七,现国内派出海外之宣慰人员颇多,但不少因:(1)对国内抗战情势本无研究,学识低,演讲术不好;(2)生活习惯奢侈;(3)旅费不足,向侨胞提捐,极引起侨胞之反感,尽失宣慰

^① 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3-465页。

之本意。^①

最初,国民党港澳党务的宣传重点,在论及“纠正纷歧错杂的言论思想”方面,还多集中在驳斥日本美化侵略和汪伪“和平运动”等谬论方面。随着国共矛盾的加剧,其宣传重心也逐步移到反共方面。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海外部针对中共的强势宣传,集中力量开展“特种宣传”,其任务“除打击敌伪之外,尤应打击奸党”。为加强宣传力量起见,“特拟具特种宣传方案,制定打击奸党宣传工作要点,并搜集各地不同情形,随时作个别指示,及时供给驳斥文稿与一般宣传材料”。事后,海外部对“特种宣传”开展以来的实际效果自我评价道:“奸党反动宣传,其在侨胞间之影响已大为低落,至本党宣传力量,则已日见效果,侨胞视听亦已日转澄清,虽奸党多方破坏,多方造谣,亦徒心劳日拙。”^②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想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但其宣传手段之拙劣,令前方党务人员极度不满。据海外部自己统计,针对事变而转发给海外各支部及党报的宣传材料仅仅四份。^③高廷梓为此向朱家骅抱怨道:“弟在此间虽是负实际工作责任,但以权、款两受限制,经常业务尚可于穷中苦斗,勉强推进。过去年余已是如此,方今共党展开斗争,本党宣传机构似应加以调整,酌增经费,使真能成为战斗力量。最近何总长皓电,本部所能印发者为数甚少,齐电本可由中央航邮发下,詎竟连日分段拍

① 《五届六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39年1—11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146—147页。

② 《五届八中全会中央海外部工作报告》(1940年7月—1941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270—271页。

③ 《颁发打击奸党宣传材料表》(1940年12月—1941年2月),《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第271—273页。

发,耗费时间、物力,又无从运用,以视共党佳电与有关文件一厚册则早已播传海外。我以密件通知同志,对方则以全部有利其自己之宣传文件撒播全世界,相形之下,效用可想而知。”^①迫于这种无奈的状况,高廷梓甚至不敢接任“特种宣传委员”一职,特致电国民党秘书长叶楚傖和朱家骅表示:特种宣传工作“其性质虽与本部工作密切关系,但非本部所能支配,似此情形,应付非常,实属棘手。恳请转呈总裁,准予辞去特种委员职务,以明责任而轻罪戾”。^②

对于国民党海外宣传工作,吴铁城在其所作的《党务检讨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因为派在国外的宣传人才,实在不多,动员海外侨胞宣传的技术,不够精到,宣传经费亦不很充足,总感觉到我们的责任,还没有能够完全尽到。老实说,我们同志在国际上的宣传战,远不及将士在国内的军事战。”^③

四 小 结

自抗日战争爆发到香港沦陷前这一段时间,国民党为加强在港澳地区的影响,特设立港澳总支部,以期努力改进港澳党务工作。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其实际效果往往事与愿违。事实上就国民党在香港地区的党务活动所遇到的诸如经费、人员等困难,共产党也同样存在,甚至比执政的国民党更难。但共产党在战时香港的党务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不仅扩大了自身的组织建设,还在最大程度内赢得了港澳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国共两党的

① 《高廷梓呈朱家骅函》(1941年1月9日),笔迹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高廷梓致叶秘书长朱部长电》(1941年1月9日),电报抄件,“朱家骅档案”。

③ 吴铁城:《党务检讨报告》(1945年5月7日),《革命文献》第76辑,第465-466页。

这一对比,充分说明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出于自身的组织建设,这一点是它根本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

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国民党内并不乏清醒的认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成员朱学贤以自己两年多来的亲身体会,撰写一份《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针对港澳党务存在的问题予以深刻总结。现将其核心内容摘抄如下,权且作为本文的结尾:

至党务方面,以环境特殊不能公开活动固影响于开展工作者甚大,其实(1)缺乏实干人员(2)总支部内部矛盾尖锐,主委与委员间、委员与委员间、委员与科长间及科长与干事间,无不互有意见。意志已不集中,力量自无由发挥。(3)随人事之矛盾,而遇事掣肘,归其根由,则不脱封建习气、门户之见过深。如每遇训练班之设立,必指倡导者持有成见,欲造成私人势力。此种恶意宣传,无异分化本党。(4)统属不严,号令不行。澳门支部向以人事问题对总支部不洽。自第三期征求新党员所派征求员未指派该部委员兼充,后遂以职权问题,鼓动党员提出质问。迄今纠纷未已。查高廷梓先生提出划分职业集团入党,而未指派该部委员充征求员或联络员,固为人口实,而下层党部公然鼓动风潮,诚有未当,亦号令不行之结果也。(5)头重脚轻,中间不动。目下党务类多注意省市县党部及海外总支部与支部各级之组织,至区分部之组织与党员之活动,多不经意。总支部年来对党员发展迅速,固属事实,部内本身尽管闹人事纠纷,而高廷梓先生之工作精神,即对其最不满意者,亦同声佩服。然大部经费集中上层,其次为支部,而分部则月仅十余元,而所辖党员则往往百余人,以少量金钱而欲推动无训练之党员工作,诚至难事。盖党员已未经主义

之灌输、思想之训练,以确立其革命人生观,类多徘徊观望,不知所云。纵或勉强集合亦如附,即合即散,不能收效。遇分部委员之肖者,尚可依期召集会议,传达中央意旨;其不肖者,则终年不开一会,更无论工作。……(6)门户独立,不相关连。已往政党之错误即纵横组织,无密切之联络,各立门户,互相磨擦,致力量抵消。港澳以环境特殊,承已往积弊或负其责者别具意图,中央与中央间(指香港中央机关)、地方与地方间或中央与地方间,均无密切之联系。如党与团不惟无联系,为招收党、团员及执行工作之关系,相互间均不免有恶意指责。平心而论,团为辅助党而领导青年,训练青年,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应接受党部领导;而党部亦应以作之君、作之师之精神,监督之,指导之,始能收党团相互为用之效。否则,以敌对地位,各行其是,互为攻讦,与异党敌对无异其不应该,固彰彰矣。又如中央在各地所设之宣传机构,中央固有指挥监督之权,而与地方党部必须切实联络,始能发挥分工合作之效,否则平时敷衍,遇事推委,影响于工作者至深且巨。如新四军事件发生后,奸党在港澳散发之宣言、传单、小册子不下数百种,而本党之宣传品计仅有闽粤宣传专员办事处编印之“如此新四军”、“抗建国策下之中国共产党”及总支部编印之“统一抗战”、本室编印之“团结抗战与中共”等数种,且不免处处追随他人,作人尾巴,已失主动,受制于人,自难收宣传之效。至海外党报缺乏管理和干部,任由腐化份子之胡作胡为,海外归侨类能道之。惟晚目未之见,固不敢妄事批评,然港澳宣传机构之不尽如人意,则属事实。故海外宣传之必须有统一管理,严格督责,健全干部与中央或地方间切取联系,确已急不容缓。以上所举盖其阻碍工作开展之大者。……至今后之改进钧座贤明英睿,当有通盘筹划,惟其最基本问题,窃以

为(1)慎用人,固根本,充实干部,茂其枝叶。(2)开展海外调工,协助党部工作,并以为中央耳目,进而运用当地机能协同外交力量,以改善侨胞生计。(3)以使馆兼负党务工作藉外交之掩护,取得相当公开活动彻底扫除藉党营私,把持党务,割据势力之腐化行为。(4)大量吸收帮会份子。查海外帮会向极著称,其已投向本党者固多,而徘徊观望或名义已加入本党而仍保存其旧组织者亦不鲜。此辈平日咸以第三者态度批评或攻击本党,其影响本党对人民及侨胞威信者甚大。今后宜以德威并济,宣抚兼施,尽量收容,使为国用。(5)厉行考绩,综名实,专其责成,安其生活,务使任使得法,命令贯彻,下情上通得以随时改进,则海外党务之开展,庶几近矣。^①

由于朱学贤自身的局限或国民党机制本身不可逾越的组织架构,其所开列的改进方案,事实也是难以实现的。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很快沦陷,国民党在港澳地区的党务活动基本停止。此后,仍坚持留在香港继续工作的倒是原总支部下辖的调查统计室,在打击日伪特工和汉奸方面有所成就。^②

(作者金以林,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刘兵)

① 《朱学贤呈朱家骅报告香港调工党务两方面之现状缺点应改善之意见函》(1941年8月7日),毛笔原件,“朱家骅档案”。

② 有关调统室在沦陷时期的工作情况可参考刘维开:《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港九地区的活动》,《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86-488页。